

古时荀子为什么会被赶出孔庙

专家精解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被称作先秦儒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的荀子，对孔子、孟子的思想有扬弃也有创新。在山东省尼山书院举办的“荀子公开课”上，中山大学教授杨海文在解读荀子思想与孔孟思想的关系时表示，“在实践伦理学层面上，从理想人格、义利之辨、移风易俗等方面进行梳理，可以清楚了解荀子思想对于孔孟思想的扬弃和创新，所以后来无论尊还是贬，都不损荀子的儒家本色。”

可以为，未必能为

杨海文认为，理想人格是儒家最追求的东西，但在孔孟荀那里还有些不一样。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人，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甚至连尧舜那样的大圣人做不到，而君子要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站得住，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行得通，也要让别人行得通，做这样一个君子就可以了。

但是，到孟子、荀子那里就不一样了。

圣人，是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其实也是圣人。荀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所谓“涂之人”，就是指走在路上的普通人，按荀子的观点，即使路人甲、路人乙，通过良好的教育，都可以成为象大禹那样的圣人。

从观点和论证方式上看，孟子、荀子的话是相差不大的。

且看荀子如何分析。荀子认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大禹之所以能够成为大禹，就是因为具有“仁义法正”的品质。“仁义法正”可以通俗理解为仁义道德。那么一般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人呢？荀子又说，“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在荀子看来，普通人也具有“知”和“能”这两种能力，有“知”，就能明白仁义道德是好的，这是一种资质；有“能”，则是拥有实践仁义道德的才具。显然，荀子认为，普通人具备了“知”和“能”，就有了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从而能够理解和实践“仁义法正”，当然就“可以为禹”了。荀子这部分的论述，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基本意思没什么区别，只是词语表达不一样而已。

显而易见，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持相似的观点。不过，这还仅仅是理论层面的论述。从事实或者实践层面上看，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尧舜呢？荀子的观点就不一样了。荀子表示，“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也就是说，“涂之人可以为禹”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但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在这里，荀子还特意打了一个比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借以说明“可以为，未必能”的道理。

荀子还认为，“虽不能，无害可以为”，虽然说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也不要紧，并不妨碍每个人内心都想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这样的说



荀子讲学图

法，这样的理念，与孔子、孟子是一致的。

后世思想家对孟子、荀子的思想也有一些评析。比如，清代学者戴震认为，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跟孟子的“性善论”一点都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发明。清代另一位学者陈澧则认为，既然孟子已经讲过“人皆可以为尧舜”了，荀子又何必把尧舜改为大禹呢？言外之意，二人在理想人格的衡量标准方面是一致的。

杨海文说，综合分析来看，孔子是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孟子、荀子是以圣人为理想人格。孟子、荀子的相关论述，如果放到一起观察，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尤其在不论及本性时，他们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道德内涵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

先义后利，更追求义利双成

杨海文表示，“义利之辨”也是儒家实践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语》记载，“子罕言利”。在“义利之辨”这方面，孔子的观点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要“义以为上”，要把道义摆在最高的位置。

到了孟子、荀子，他们在这方面观点的相似度同样特别高。

《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的首章，文中鲜明展示了孟子的“义利观”。其中记载孟子千里迢迢去见梁惠王，意图感召梁惠王施行仁政，二人之间有一段精彩对话。梁惠王开口就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显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孟子认为是要先义后利。孟子还从反面论证，“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履”，如果以利为先，看重利而不顾道义，那么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

先义后利，是不是不要利呢？不是，孟子主张义利双成，既要得到道义，同样也要得到利益，即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后世黄宗羲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句话非常重要，《孟子》的“七篇以此为头脑”，也就是说孟子的所有思想都是在这句话的驾驭下展开的。

荀子关于“义利之辨”的表达方式基本上也差不多。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正是与孟子同样的先义后利。

同时，荀子还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遵循仁义

道德与逐利求富是人人都具有的两个方面，这不就是义利双成？

荀子进一步阐释，“保利弃义谓之至贼”，那些为保全利益而违背道义的，可以称作大贼。

推而广之，荀子认为，“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在社会治理中，如果民众对正义的追求胜过对财富的追求，可以称之为治平之世；如果对财富的追求胜过对正义的追求，便是衰败的乱世。

杨海文说，荀子的“义利观”，原则上也是以义为上，同样讲究先义后利，目的也是追求义利双成。综合来看，在“义利之辨”方面，荀子跟孟子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移风易俗，莫善于礼乐

杨海文说，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荀子，对“移风易俗”都非常关注。具体如何去实施？各家又有自己的论述。

先看孔子的观点。《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荀子认为，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一样，草一旦遇到风，它必定会伏倒下来。另外，《孝经》里面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句话也非常有名。

在思想观点上，孟子接过了孔子讲的第一句话，荀子接过了孔子讲的第二句话。这两句话都属于实践伦理学的范畴，改变风气、改变风俗很重要，怎么去实现呢？要靠礼乐文明来改造。《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的话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意思是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声音那么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更能得到民心，讲的正是教化对于“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荀子倡导“移风易俗”，是为了让礼乐文明能够通过教化的方式，让百姓能够和谐的生活。

《荀子·乐论》中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善民心，让民心朝着善良的方向发展，而且音乐感人深刻，能够移风易俗，所以古代圣王都是建立良好的礼乐文明制度，让百姓和睦地生活。

尤其要注意的是，《荀子·乐论》中讲得“移风易俗”，是强调调性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同时还论述到，“故乐

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显然，荀子认为，音乐可以使民心向善，使社会风气和习俗得以改变，所以礼乐兼用，才能使社会安定。

杨海文认为，上述《荀子·乐论》篇里的话，在《礼记·乐记》中也有几乎一样的记载，只是偶尔有一些字不一样。所以，谈到荀子“人性论”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跟《礼记·乐记》应该是存在某种关联的。对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古今众多学者作过深入研究，成果浩繁。在这里特别说明的一点，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主张把“仁”和“礼”很好地结合起来，后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可以说，礼学是荀子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孔孟思想扬弃之后的重大创新。

尊荀与贬荀，何妨统合孟荀

杨海文表示，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荀子既然和孔孟在思想上有这么多相同的地方，为什么在思想史上的命运跟孔孟大不一样？

其实，在汉唐时期，孟子、荀子是并列齐名的，比如在《史记》中，孟子、荀子的列传是放在一起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就是孟子、荀子的合传，当然该篇并非仅记孟子、荀子二人事迹，还记载了道、墨、法、阴阳等各家代表人物12人。

在唐代，韩愈也认为孟子、荀子是并列的。

宋明之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荀子受到批评越来越多。“二程”之小程就认为，荀子不好主要是因为主张“性恶论”，小程的观点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朱熹也表示，就不必理会荀子了，理会孟子的“性善”就可以了。但是，宋明理学一边骂荀子，一边还是借鉴了荀子的思想。在讨论人性问题的时候，宋明理学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气质之性”，就来自荀子的“性恶论”。

这段时间，荀子也不是没有受过推崇。孔庙、文庙除了祭祀孔子外，还有从祀制度，附祭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等。北宋时的1084年，荀子其实已经进了孔庙的，但是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1531年，荀子又被赶出了孔庙。

那么，荀子为什么会被人赶出孔庙呢？在理学家看来，荀子主要有三件事情做得不对。一是孟子讲“性善”，荀子为什么非要讲“性恶”？二是荀子教出的两个学生李斯、韩非子，都是法家代表人物。三是荀子写了“非十二子”，批评了12位学者，批评其他人还好说，为什么要把子思、孟子也一起批评了呢？特别是到了晚清，尊荀与贬荀都一起出现了。批评荀子的声音中，最著名的是谭嗣同的观点。在《仁学》中，谭嗣同说，“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言辞之激烈可见一斑。

尊荀的声音也很重要。汪中认为，荀子对于儒家的传承至关重要，“六经”都是荀子传下来的。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严可均，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恢复荀子进文庙的资格。章太炎认为，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荀子就是后圣。

郭沫若认为，荀子是一位大师，不仅集先秦儒家之大成，而且集诸子百家之大成。杨海文表示，最近以来，“统合孟荀”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比较有影响观点。

那些“行话”词典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据上海东陆图书馆公司1924年版影印

□ 邵燕梅

使用隐语是人类自我保护和群体别同在言语中较为显著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我保护和群体别同而表现出的一种能力。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隐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隐语是某些社会群体内部为了对外保密而创造和使用的隐晦性语言形式（包括语音、词汇、句子等形式），属语言变异现象。狭义的隐语是某些社会群体内部为了对外保密而创造和使用的隐晦性词语，属词汇变异现象。

自古以来，汉语隐语的异名较多。自隐语诞生以来，其所使用的异名多达四十余个，自春秋以降至清代共使用“隐”“隐语”“度辞”“市语”“隐戏”“度语”“谜”“锦语”“切口”“春点”“春典”等十余个异名

称谓。现代的称谓则更多，除了“隐语”之外，还有“切口”“黑话”“江湖黑话”“江湖切口”“秘密语言”“秘密语”“秘语”“行话”“民间隐语”“民间秘密语”“民间秘密用语”“民间秘密行话”“隐语行话”“民间隐语行话”“暗语”“市语”“私语”“切语”“春点”“春典”“寸点”“反切语”“同行语”“打坎子”“侃子”“调侃子”“锦语”以及“胡芦语”“锁子语”“纽语”“三折语”“市语”“查语”“锦语”“芦子语”“回且语”“方语”“声嗽”“瞎子语”“麻雀语”等众多方言称谓。

隐语发端于先秦，唐宋发达，明清兴盛，传承流变至今，具有较为清晰的发展、传承、创新、演变之轨迹。由于领域之狭窄，隐晦性之强，使用时不仅是对人智力的一种考验和挑战，也是对使用群体新规律性、语言别同性的一种创造和发展，因此，隐语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关注。

史料中对于隐语最早的记录见于《吕氏春秋·重言》：“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隐。成公贾人谏，王曰：‘不穀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原与君王隐也。’王曰：‘故不穀谏？’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宽民则也。是鸟虽无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谏，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通‘悦’），荆国之众相贺也。”尽管该种“隐”是一种运用隐喻手段的修辞现象，但不可否认它即隐语的源头，汉语隐语自此开始了它不断的分化与发展、继承与演

变。

自先秦以来，汉语隐语先后出现过密谈、谜语的前期形式、婉曲的表达方式即隐喻手段、私语、隐晦性词语五个意义。“隐晦性词语”一义形成于晋代，见于《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从随出睿使宣旨，告诸期二月十日，同时封符。手书隐语曰：在彼杨水。睿先旨特降。究观虚实。特问城中。”自该义于晋代形成后，“隐语”一词便成为单义词，不再指称其他意义。

自宋代以来，自觉性的隐语辑录类文献诞生。陈元靓《岁时广记》收录360多条汉语隐语，以通语为词目，注以隐语，可以称为历史上首部具汉语隐语辞书性质的隐语辑录。同时期的还有汪云凤《圆社锦语·蹴鞠篇》，辑录汉语隐语130余条，开创了历史上以通语释隐语的汉语隐语辞书体例先河。宋代开创了汉语隐语辞书最初两种基本体例，此后的隐语辑录或辞书皆以此为基础。之后的汉语隐语辑录见于明、清两代，明代分别有无名氏《行院声嗽·墨城小录》，收录汉语隐语370余条，其体例为列通语为目，注以隐语；程万里《六院汇选江湖方语·鼎彝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收录汉语隐语150余条，体例为以隐语为目，释以通语。清代唐再丰《江湖通用切口摘要·鹤幻汇编》收录汉语隐语320余条，以通语为目，注以隐语；卓亭子的《新刻江湖切要》所收汉语隐语词条最多，共收1600余条，通语为目，注以隐语，其开辟了汉语隐语辑录单行本的先河。

民国时期对于汉语隐语和汉语隐语辞书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时代。《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全一册）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由上海东陆图书馆公司印行出版，是汉

语史上首次以“词典”命名、真正意义的汉语隐语辞书。全书共收隐语9125条，所收汉语隐语依据行业群体进行编排，分为商铺、行号、杂业、工匠、手艺、医药、巫卜、星相、衙卒、役夫、武术、优伶、娼妓、党会、赌博、乞丐、盗贼、杂流等大类，大类之中又细别若干子类，共计18大类376个子类。该词典体例以隐语为目，释以通语，例如，丝经业切口的“人言儿”隐指“信”，“人奉儿”隐指“薪水”（即“俸”“禄”），皆为拆字隐指；“近却”隐指“无”，由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而歇后隐指；山货业切口的“秀才”隐指“青梅子”则是由于青梅之味道之“酸”与秀才的“穷酸”通感隐指。

《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由序、目录、正文三部分组成，“序”由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缶老人”吴昌硕先生撰写，开篇即点出“近顷坊间之出版物夥矣。而独未及于切口。何也。岂以事属渺小为无足道耶。果如是则谬矣。”吴昌硕先生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了《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的语言学价值。该词典编写人员阵容强大，除“责任编辑”外，还有七位“分任撰述员”，足见当时之重视程度。时“定价大洋贰元”，如此不菲的定价说明了该隐语辞书制作规格的高度，这与当时对于汉语隐语的社会学及语言学价值认识之高度是吻合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开启了现代汉语隐语研究的新时代，不仅确立并奠定了现代汉语辞书辞书的规范和标准，也成为《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曲彦斌、1995）、《中国秘密语大辞典》（陈峙、2002）等“切口”系后出隐语辞书的编纂标准和词条的主要来源。

文化视点

首部反映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的电影

《高家台》首映仪式举行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任万帅 报道
本报讯 11月23日上午，首部反映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和高质量发展的电影《高家台》在济南举行首映仪式。导演杨真，演员代表马诗红、左腾云、杨欣、袁媛以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全国数字电影院线代表、全省电影单位代表参加首映式并观影。

电影《高家台》以近年来山东省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的重大民生工程为背景，通过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高家村历经旧村台改造，发生历史性巨变这一独特视角和剧情设置，用精细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创新手法，形象化、艺术化地展现了共产党韩明军（马诗红饰）返村担任支部书记，带领支部一班人，发挥基层党支部坚强堡垒作用，以“守望相助，累土成山”的石夯精神凝聚力量，率领村民完成旧村台改造工程，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

在表现手法上，影片对“房台”这一特殊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刻展现，并将具有代表性的“石夯”作为重要道具贯穿始终，挖掘出了黄河滩区群众“守望相助，累土成山”的石夯精神，是一部兼具时代性、政治性、艺术性和地方特色的优秀影片。

2020汉语盘点等你来“盘”

据新华社，“新冠”暴发，人类命运“风月同天”；“共克时艰”，抗“疫”战士“最美逆行”；火了“夜间经济”“直播带货”，奋战“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用一个字词总结即将过去的2020年，你怎么选？

记者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近日在京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0”启动仪式上获悉，活动将陆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词语”，“年度字词”将于12月21日揭晓。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推出“专家版本”和“大数据版本”的年度推荐字词。据介绍，今年的活动将用短视频呈现字词，实现文字学、图片、短视频全媒体传播，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活动，让网友实现“云参与”。“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15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西汉画像砖拓片“回家”

据新华社，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日前为河南省洛阳市寄来19张画像空心砖拓片。

“这些拓片拓自该博物馆收藏的14块西汉画像空心砖，内容有反映汉代礼仪制度的揖让、田猎活动，体现升仙思想的祥瑞瑞兽，以及呈现汉代尚马之风的车马场景等。”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徐焯非介绍，对比洛阳现有的西汉画像空心砖文物，拓片中的不少内容实属罕见。

画像空心砖是流行于汉代的建筑材料，主要用于墓葬建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金村一带出土大量西汉画像空心砖，其体量宏大、内部空心的独特形制和砖上精美绝伦的画像引起古董商和外籍传教士的关注。

“这批拓片形式回归的画像空心砖，就出土于金村附近的汉墓，1931年前后由时任河南主教的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怀履光收集，后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徐焯非说，“该博物馆收藏的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有近60件。这批回归的拓片制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身也是文物。”

近年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积极开展合作研究工作，研究对象以该馆收藏的洛阳出土文物为主。据了解，双方将就各自收藏的画像空心砖拓片展开更广泛的交流，计划于明年在洛阳市联合举办“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展”。

《钱钟书选唐诗》出版

据新华社，为纪念钱钟书诞辰110周年，一部由钱钟书选定、杨绛抄录的唐诗手稿，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排印成书，近日正式发布。

钱钟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著述丰赡，其中《宋诗选注》一书出版发行60余年，是受到学术界赞誉和大众读者好评的经典选本。作为品读唐诗和书法艺术的“日课”，自20世纪80年代起，钱钟书以《全唐诗》为底本，进行唐诗选录，最终形成了“钱选杨抄”的“全唐诗录”九册手稿，在尘封数十年后得以正式出版。

《钱钟书选唐诗》共选录308位诗人的1997首（句）作品，其中，白居易以184首作品超过杜甫（选录174首）位列第一；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明皇、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如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愈的《嘲鼾睡》这类有趣味性的作品。

钱钟书曾说，“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这被看成他选诗的主要依据。

专家认为，《钱钟书选唐诗》充分体现了钱选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时，近2000首作品的体量，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唐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也为大众读者研读欣赏唐诗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提供了更完备的选本。（□记者 张依盟 整理）

